

# 抗战时期日本在上海的文化侵略

——以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为例

石 嘉

**内容提要** 1937年3月,日本在上海成立近代科学图书馆。该馆成立伊始,受制于各种不利因素的掣肘,发展缓慢且一度闭馆。上馆复馆后采取一系列行动,在推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,加强日本在上海的文化侵略。日本政府则从经济上、政策上加强对上馆的操控,使其全面配合日本当局的侵华国策,该馆嬗变成日本侵略上海的一个重要机构。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,上馆最终随着日本的败亡而解散。

**关键词** 抗战时期 上海 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 文化侵略

石 嘉,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、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300071

日本强占东北以后,继而策划华北事变,妄图吞并华北。日本加紧对中国军事进攻的同时,亦强化了文化侵略。1935年,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若衫在《对支文化事业改善案》中,明确提出要实现“对支文化事业”根本方针的转变,“我对支文化事业从来脱离政策的立场,采取主要着眼于纯学术研究之方针,今日遭遇重大变局,此种方针有必要发生根本变更,我文化事业部应秉承当局政策,根据日满提携确立东洋和平之经纶,在支那实现文化开发和日支文化联系”<sup>[1]</sup>。此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决定在中国推行所谓的“新规事业”,目的在于介绍日本近代科学,“利用本邦资金、技术应用于支那的资源开发,满足本邦经济之欲求”<sup>[2]</sup>。此种“新规事业”,主要包括筹建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、中日学院附设农事试验场、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(以下简称上馆)、北京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。日本控制华北以后,又企图将其侵略触角伸向上海乃至整个中国,遂成立上馆,作为侵略上海的一个重要据点。本文拟就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及其他资料,介绍上馆的成立始末;上馆复馆后的运营,并揭露

[1]《对支文化事业改善案》,《各国ノ团匪賠償金処分關係雜件ノ日本ノ態度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050151299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。

[2]《執務報告 昭和十一年度文化事業部ノ1936年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100706143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。

其文化侵略行径;分析日本政府对上馆的政策和管理,以论证日本“对支文化事业”的侵略本质<sup>[1]</sup>。

## 一、上馆的发轫

1936年5月,日本特别议会提出1936年度新事业预定经费,其中上海和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助成金额各为60,000元,包括图书搜集购入费50,000元、设备费10,000元<sup>[2]</sup>。在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以及日本民间学术、出版、经济等团体的联合赞助下,1936年11月日本在上海开始筹建上馆,1937年3月该馆在上海市四川路一四九号宏业大厦楼下正式开馆。汪精卫为其题词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”,其他尚有孔祥熙、孙科、王宠惠、于右任、邵力子、蒋作宾、黄金荣、刘海粟、俞鸿钧等各方名流题词,该馆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。上馆成立目的在于,“收藏关于商、工、农业等技术的、实用的图书,供给中华人士公开阅览,举行有关日本事情的演讲、发表、宣传,并介绍日本近代文化产业部门,通过此类活动实现日支经济提携之目的”<sup>[3]</sup>。另外,方便中国人阅览日译欧美书籍,“欧美各国切合实用书籍,皆已译成日文,故凡已学日文者阅览至便”<sup>[4]</sup>。毋庸讳言,上馆核心要务还在于加大日本文化宣传,强化对华文化楔入。

姓名	上崎孝之助	真田茂	赖贵富	松井松次	宫原正巳	船津辰一郎	新城新藏	大内畅三	吉田政治	甘浓益三郎	上崎孝之助
职名	馆长	雇员	同	同	同	理事	理事	同	同	同	同
履历	早大毕业,原东京朝日经济部次长	中学毕业,图书讲习所修学	台湾商工学校毕业,朝日调查部员	东京高师毕业	中学毕业,图书讲习所修学	名誉馆长、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	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	同文书院院长	商工会议所会长	民团长	同前

上馆成立以还,日本当局以船津辰一郎为名誉馆长,上崎孝之助为馆长,并成立理事会,以下仅列出该馆成立初期主要成员情况<sup>[5]</sup>:

此后上馆复又增聘铃木贤佑为总务主任、兼副馆长,森清为司书。司书职掌图书馆各项实务,诸如图书目录编制、图书分类、图书购入、图书整理保管及统计、书库整理、图书借阅、图书室设备及整理等事宜。

上馆所藏书籍主要包括哲学、历史科学、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、工艺学、产业学、语言学、文学等门类,尤重经济、产业方面的书籍,凸显出其藏书鲜明的实用特色,亦是基于上海商业大都市的定位与考量。1937年3月,上馆所藏图书总计10,378册,中、日、英文报纸27种、杂志月报322种、小册450种,合计799种<sup>[6]</sup>。该馆藏书源自外界购入和团体、个人捐赠。书籍购入方面,如1938年购入789册、价格为2,326.5元,其中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两种书籍最多,合计459册、超过总数的58%<sup>[7]</sup>。至1938

[1]关于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,目前仅见个别日本学者有所论及,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:山根幸夫:《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について》,《東京女子大学:史論》第33号,1980年;米井勝一郎:《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史の一研究》,《図書館文化史研究》第14号,1997年5月;这两篇论文考察了该图书馆的组建、运营、发展脉络,然二氏著对日本文化侵略行为的论述不免失于疏略。阿部洋:《「对支文化事業」の研究——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》,汲古書院,2004年1月;山根幸夫:《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: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交流》,汲古書院,2005年1月;这两部著作对该图书馆均有所论述,后者对其论述更为详尽。殊为遗憾的是,二著均对上馆在华侵略行径大抵讳莫如深。

[2][4]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:《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概要》,1937年3月,第3页,第3页。

[3][5]《執務報告 昭和十一年度文化事業部/1936年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 B100706143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。

[6]《上海図書館開館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二年三月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関係雑件 第一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 B050160011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。

[7]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:《昭和十三年事業成績報告書》,1939年5月,第9页。

年底,上馆购买各类书籍总数共计11,671册。书籍捐赠方面,1936年共获赠1,547册,1937年增至1,640册,1938年增至2,143册<sup>[1]</sup>。捐赠者来自中日两国公私团体、个人,如1937年中国赠送《全国文化机关一览》、《常用筒子表》、《为世界语主义的世界语》、《新时代月刊四月号》、《妇女旬刊十年年刊》、《中外经济选萃》(第一卷第四期)、《中国银行月刊》、《中国银行报告》、《Bank of China》、《中国国际图书馆概要》、《中国国际图书馆图册》、《上海图书馆概要》等书籍<sup>[2]</sup>。1938年日本外务省赠送上馆数十种书籍,以调查报告、统计、经济、产业、政法、教育、史地等类别书籍为主<sup>[3]</sup>。至1938年6月,上馆全部藏书已达2万余册。1938年底,“本馆又获赠下村宏旧藏海南文库(约3万册)的大部分书籍,掘拔义太郎藏书(约1万册)和入泽达吉遗藏云庄文库(册数不详)的书籍”<sup>[4]</sup>。使得上馆得以新增两大文库,其藏书在质和量上有了一个大飞跃。

为加强管理,上馆制定严格馆则。其中规定馆内图书均免费阅览,然“带有酒气者、着装令他人感到不快者、患有疾病者或其他本馆认为难以成为其借阅者均谢绝入馆”。“严禁在阅览室朗读、谈话、饮食、吸烟等其他喧哗骚扰行为。”如有违反者,馆员即时制止并勒令其退馆。借阅书籍时,“如有丢失、污损者须按该书原价赔偿,且日后谢绝再次入馆”。馆外借阅分个人和团体借阅,“个人借阅时须年满12周岁以上,并持有优待券或有馆长指定保证人的保证书,亦或馆长认同借阅人的身份者”<sup>[5]</sup>。团体借阅,仅允许上海市内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学校及其他馆长认可的公司、团体、设施。个人或团体借出图书均须出示特许证、保证书和保证金。馆内读者须在阅览票上注明借阅书籍和借阅者信息,退馆时及时归还图书。从以上馆则,可管窥其借阅制度之严苛、繁琐。

上馆肇始之际,主要办理业务有:“1. 陈列图书、新闻杂志及其他刊物免费阅读事项;2. 上海各中国公共团体及图书馆借阅本馆图书事项;3. 日本文化之各种询问查复事项;4. 中日两国间之经济产业研究事项;5. 各种讲演会及学术研究会主办事宜。”<sup>[6]</sup>该馆还计划,发行中、日文合刊杂志;主办中日学者、技术家演讲会;公映科学文化电影及介绍日本各种事情;办理中国学者、学生对于研究日本问题之本馆场所租借事宜;介绍日本产业、学术事项及其他事宜。上馆试图通过出版刊物、举办演讲、利用影视、学术交流等方式扩张其影响力和日本文化的渗透力。

## 二、上馆的运营

上馆起初运营不甚理想。首先,人事与管理机制不善。馆长上崎,“此人系东京朝日经济部次长,从来与图书馆没有任何关系,他在日本对华侵略方面,是持积极的意见”<sup>[7]</sup>。尽管上崎在图书馆运营方面没有任何抱负和见地,然而日本当局更重视的还是此人的政治立场和早先身份,故有其任命。副馆长铃木、司书森清原为“青年图书馆员联盟”成员,颇具图书馆革新意识,却屡遭馆长上崎反对,铃木、森清与上崎的对立关系日益白热化,二人最终提出辞职。加之上馆成立伊始所定馆则过于严苛,因而限制了读者人数。人事不合、管理欠妥终成其发展之桎梏和束缚。相较北京近代科学图

[1]按,此数据应当未包括此后“海南文库”和“云庄文库”两大个人文库书籍数量。

[2]《上海図書館へ支那側ヨリ寄贈資料報告ノ件 昭和十二年三月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関係雑件 第一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 B050160010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。

[3]《寄贈希望印刷物リスト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関係雑件 第三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 B050160029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。

[4]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:《昭和十三年事業成績報告書》,第9页。

[5]《上海図書館処務規程制定ノ件 昭和十二年四月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関係雑件 第一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 B050160013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。

[6]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:《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概要》,第9页。

[7]山根幸夫:《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: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交流》,汲古書院,2005年1月,第175页。



图书馆,未免相形见绌、逊色一筹,其馆长山室具备丰富的图书馆管理经验,且非常热心于图书馆的运营,又得到菊池租等人协助,其规模不断扩大、业务日趋扩张,1938年该馆成立西城分馆、1939年开设北城阅览所。其次,战争波及。上馆开馆不及半年,1937年8月,日军全面进攻上海,松沪会战爆发,为避免其书籍和设备毁于战火,该馆决定闭馆并迁往日本,仅在日本东亚学校内设立临时事务所,直至1938年6月复馆。不无讽刺意味的是,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祸及中国,连其本国所谓“对支文化事业”亦难幸免。上馆读者人数较少,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发动野蛮侵略战争,激起全上海、全中国人反抗,“共产党、国民党或其他抗日团体利用‘七·七’、‘八·一三’、‘九·一八’等纪念日进行抗日宣传、斗争,对本馆利用之消长产生极大影响,在‘七·七’、‘八·一三’当日、数日或数十日之前租界处于全部戒严状态,一般通行人员明显减少,本馆利用者人数亦因‘纪念日’活动而波动明显”<sup>[1]</sup>。鉴于以上缘由,上馆复馆后,进行了一系列调整:

其一,注重选购书籍,迎合读者兴趣。上馆在彰显其藏书特色之余,亦注重迎合上海市民之阅读偏好,“本馆于日本最近刊行关于经济、产业、技术等主要图书之搜集尤其加以注意外,再网罗法律、自然科学等专门书籍,又再齐备娱乐本位之小说、大众书籍、儿童家庭书籍,再加以在东京购进之新基本图书参考书”<sup>[2]</sup>。随着藏书量的增加,上馆又先后成立“上海文库”、“西文日本文库”、“华译日本书文库”等书库,分门别类整理各种书籍,便于读者查询、阅读。

其二,发行图书目录和馆报。1939年3月,上馆刊行《藏书特殊目录:支那·满洲·蒙古》,共介绍1,044种书籍,包括总记、哲学思想、宗教、历史、地志、政治、外交、行政、法制、经济、贸易、商业、工业、农业、自然科学、艺术、语言学、文学等门类。此后该馆又发行《图书分类目录:精神科学》、《图书目录分类目录:历史科学》、《图书目录分类目录:文学》、《增加图书目录》、《消夏读物百种》等目录,其中《消夏读物百种》是由该馆精选120种书籍并将其制成目录,适于读者夏季休闲、消暑时借阅。另外是发行图书馆馆报,其内容涉及,“本馆事业、设施、内容及利用制度的解说,日常业务报告,调查研究的发表,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动向,图书及图书馆及相关部门的报道、感想或杂文等,新刊书、新到书的介绍,利用者之声等”<sup>[3]</sup>。藉此增强该馆的宣传力和影响力。

其三,调整人事和管理机制。上馆复馆后,一改以往严苛馆则,例如1940年其管理简章规定,“凡欲借读本馆书籍概不收费;本馆之书籍除在馆阅读外,并可随意借出阅读;若借出仅需缴纳保证金法币5元,本馆即发给图书携出证,日后凭携出证借阅书籍不限次数,年满一年后退还保证金和图书携出证”<sup>[4]</sup>。由此获悉,其馆则发生明显转变,无须再出示优待券、特许证和其他身份证明,放松了对读者限制,自然有助于增加读者人数。人事方面,上馆成立初期,中国职员仅赖福贵一人<sup>[5]</sup>,复馆后有意增加了中国职员,“馆长以下十余人,中国人有五人”<sup>[6]</sup>。以更好地“服务”于中国读者。另外,铃木、森清等人辞职后,楠田接任司书,此人热衷于“馆外活动”,曾著有《移动图书馆之研究》(動く図書館の研究),文章认为其时各大小图书馆均以馆内阅览为主,从而陷入闭塞状态,难以真正接近读者、满足读者需求,欲打破此种闭塞状态,就当“移动图书馆”,积极开展各种适当的、不计报酬的馆外活动和服务<sup>[7]</sup>。

[1][3]《昭和十三年度助成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関係雑件/経費関係 第二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050160041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。

[2]《近代科学图书馆自本日起开馆》,上海《新申报》,1938年6月1日,第3版。

[4]《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簡章 昭和十五年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関係雑件 第三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050160031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。

[5]按,赖福贵,原籍广东,曾任东京朝日新闻记者十年,并著有《蒋介石之伟大》,历任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司书等职务,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,此人也于1938年底辞职。部分参考《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一瞥》,上海《大晚报》,1937年3月31日,版面不详。

[6][7]山根幸夫:《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: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交流》,第183页,第182页。

据此,楠田组织上馆开展一系列活动:

一是开设夜间街头文库。1940年上馆在上海租界爱多亚路爱多市场开设夜间街头文库,活动时间为7月15-21日每晚8-10点。该馆大肆宣传,“此项文库是为中华人士在意想中所要认识的‘日本是怎样一个国家’而设立,内中备有多量的各种书报、照片、杂志、小册子、报纸等,使人百看不厌……至于费用是完全免费,并且对每个来宾都赠送拍纸簿一本,更有茶水等设备专供诸位使用”<sup>[1]</sup>。此次活动共展出37种书籍,主要介绍日本文化、艺术、城市、旅游、民俗国情等内容。街头文库开设期间,阅览者总计5,989人,中国5,921人,平均每晚阅览者人数846人<sup>[2]</sup>。看似此种活动为上海民众提供不少文化服务,然仔细分析其设置地点,即可窥见其真正意图。1937年底整个上海除了公共租界这一“孤岛”外,其余均已沦陷,该租界是上海进步人士坚守抗战的最后阵地,因而被日本当局视为“抗日阵营的温床”。在此处设立街头文库其真实目的在于,加强日本文化在租界的渗透和扩张,扼杀中国进步人士反日、抗日运动,同时毒化租界上海青年的思想,令其彻底服从日本的殖民统治。

二是举办展览会。1940年12月14-27日,上馆举办近代日本文学展览会,欲通过向上海青年知识分子宣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化建设,“发扬日本民族精神的优秀性和日本国民道德,打破彼等呼号的‘武力的日本’、‘侵略的日本’反日观”<sup>[3]</sup>。该展览会分五部:即总说部、歌人部、小说家部、俳人部、参考部,主要涉及日本文学、小说、戏剧、艺术等内容。该馆有意加强了此次展览会的宣传:“向中国商店、公司、银行、学校、官公署、工部局等其他公私团体发送宣传画;向个人发送请帖、明信片;在《新中国报》、《平报》、《中华日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申报》等报纸上刊登新闻广告”<sup>[4]</sup>。展览会后,上馆对参会者做了详细调查,“依署名簿入场者总数为5,976名,中国人4,620人、占全体的77.3%,日本人1,348人、占总数的22.6%,其他外国人18人、占总数的0.1%;年龄方面,25~30岁的入场者数居首位,占全体的60%,其次为30~35岁者,占全体的19%,20~25岁者居第三位,占总数的18%”<sup>[5]</sup>。依此调查可窥知,本次展览会主要面向上海青年,通过宣传日本文化,特别是所谓的“东洋道德复归”、“新东亚建设”,对其灌输亲日、媚日意识。此种文化侵略势必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。事实上,此次展览会举办之前,就遇有爱国反日人士的坚决反对和抵制,“此次展览会,最初预定租用南京路、四马路旁边的百货店大会场,因突逢意外障害而中止,为避免展列的重要资料毁于抗日分子的灾祸,只得休止图书馆阅览室,将全部馆室用于陈列展览会资料”<sup>[6]</sup>。此后上馆竟无视上海民众的反对,复又举办华北武汉摄影展览会、日本观光写真展览会、电影与音乐会等活动。

三是推动馆际合作。上馆复馆伊始,就极力寻求与其他图书馆合作。1938年8月,上海福州路成立中国流通图书馆。上馆对这家图书馆的组织、内容进行详查后,便积极展开交涉,中国流通图书馆最终迫于日方压力而与其合作,并实行馆际互借,双方还制定互借规约,其中一条规定,“双方互借之书籍交换书目,借书时按书目互借,惟贵重书及参考书、新闻报纸、杂志不在此例”<sup>[7]</sup>。据此规定双方互换各自藏书目录,并在日方的监督下,中国流通图书馆所藏抗日图书全部依照目录被清除出去<sup>[8]</sup>。客观而言,馆际互借着实有利于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,便于读者掌握更多文化信息,此种办法至今仍在沿袭。然日本的主观动机,绝非仅限于此,而是欲籍馆际互借之名义在中国占据更多的文化资源,

[1]《街頭書室開幕 昭和十五年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關係雜件 第三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050160031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。

[2]山根幸夫:《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: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交流》,第182页。

[3][4]《近代日本文学展覽會報告書 昭和十六年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關係雜件 第三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050160032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。

[5][6]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:《在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一覽》,1941年2月。

[7][8]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:《昭和十三年事業成績報告書》,第16页,第15页。此规约共计六款,具体内容详见报告书,文中兹不赘述。

并销毁抗日进步书籍,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奴役与控制。另外,该馆还加入所谓的“上海图书馆人俱乐部”。此俱乐部系由日本在上海的同文书院图书馆、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、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以及稍后加入的上海满铁资料室合力组建,“旨在加强图书馆之间的联络、交换业务上的意见或情报、增进作业上的协作以及同业者之间的亲睦”<sup>[1]</sup>。该俱乐部每月举行联合会议,1939年1月,会议通过上海满铁资料室的提案,即制作上海各馆图书联合目录和外国杂志联合目录。此俱乐部的成立,无遗又加强了日本在上海几大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,更加方便了日本在上海搜集文化情报、控制文化资源。

四是开办日语学校。1938年6月,上馆组织日语学习班,对普通中国人实施日语教学。1939年4月,因日语学习班规模扩大,该馆对其进行改组,改称上馆附属日语学院,并设有初级班、中级班,教学人员均为该馆馆员,其选用教材主要有,《日语读本》(日本东亚学校主编)、《现代日语读本》(将君辉著)、《中日会话集》(丁卓著)、《日语讲义》(上海大松日语专修学校编)<sup>[2]</sup>。该院重点招收上海青少年,据统计,1938年10月-1939年3月,正式学员总计49人,14-29岁者37人,占总数的75.5%<sup>[3]</sup>。上馆创办日语学校,名义上是帮助中国人学习日语,让他们更好地阅读馆内日文书籍,实则为了吸引更多上海青少年读者,同时加强对其进行日本文化的“熏染”与“洗礼”。

五是加强在华调查研究。日本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设立大批文化、教育、科研、医疗等机构,表面上是援助中国文化事业,实而利用这些机构充当间谍,广泛搜集情报,上馆亦扮演着相同角色。上馆的调查范围主要包括,“本馆运营直接相关事项,中国的产业经济以及日本在中国的产业经济等相关问题”<sup>[4]</sup>。例如1938年调查要项有,“华人用著者目录及著者目录中标目的排列法;南京、苏州以及杭州分馆设置案;关于日本教习调查及本馆附带教习设置案;虹口分馆设置案;虹口及其附近地带住宅、公寓、旅馆的调查;设立上海经济研究所具体案;上海医学院设立具体案;黄浦江两岸所有码头使用状况;上海的机器厂、造船厂的调查;日本图书在上海的销售制度调查”<sup>[5]</sup>。分析其调查内容,部分与该馆经营有关,其他则是刺探上海的经济、贸易、工业、文化等情报。

经过楠田等人的努力活动后,上馆发展迎来“短暂的春天”,1937年4月读者人数为1,917人,5月1,942人,6月1,877人,7月1,957人;1940年4月读者人数增至6,814人,5月8,451人,6月8,391人,7月9,037人<sup>[6]</sup>。读者人数增长,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,八一三事变之后,整个上海除租界外均已沦陷,日本侵略者疯狂迫害、屠杀上海抗日进步人士和无辜市民,许多市民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避入图书馆内,因为该馆是“照顾”中国人入馆者的安全的<sup>[7]</sup>。该馆企图以此方式招徕更多读者,缓解上海民众的反日情绪,并促进所谓的“中日亲善”。然而,“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,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日友好是不可能的”<sup>[8]</sup>。

[1][3][5]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:《昭和十三年事業成績報告書》,第17页,第21页,第22页。

[2]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:《日本語学習指導概況 昭和十三年十至十二月》,1939年1月。

[4]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経費関係 自昭和十一年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関係雑件 / 経費関係 第一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 B050160036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。

[6]《昭和十二年上海図書館閲覧者報告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関係雑件 第一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 B050160019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。并见于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:《在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図書館一覽》,1941年2月。

[7]按,日本学者山根幸夫认为,当时上海许多进步人士极端仇日、反日,日本当局利用汉奸对他们进行迫害、镇压,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则趁机收买、利诱上海民众,如广泛招徕读者并照顾其安全,甚至将原馆名中的“日本”二字去掉,改称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。

[8]山根幸夫:《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: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交流》,第185页。



### 三、日本政府的操控

上馆成立初期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主管,图书馆经费主要由该部从“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助成金”中拨付<sup>[1]</sup>。1937年,外务省预定补给该馆助成金60,000元,后因七七事变资金紧张,遂支付55,000元;1938年补给60,000元;1939年以后转由兴亚院补给,是年补给99,300元<sup>[2]</sup>。外务省还严格规定助成金使用范围,“1. 图书馆的经营;2. 关于日本近代科学及产业状况介绍的图书购入、收藏及公开阅览;3. 以普及日本近代科学及产业知识为宗旨的讲演、电影、摄影;4. 其他外务大臣认为之必要事项。”<sup>[3]</sup>并从经济上严格管控上馆的运营,该馆助成金及其他收入金,必须由上海日本总领事指定银行以图书馆名义存款;每年必须向外务大臣提交助成金收支出纳统计簿、收支结算书及财产目录;助成金购入设备及图书的处理应预先得到外务大臣之许可,外务大臣随时派遣官员对其收支结算及经营实况进行鉴查;如违反外务省之命令,将立即停付并收回所有助成金。

日本政府还加强对上馆的日常管理。图书馆经营方针及与内外官厅交涉必须遵照外务省指示,具体事宜则由上海日本领事馆操纵。“图书馆馆长、总务主任、司书及会计主任之任免须经外务大臣批准,图书馆助理及嘱托之任免须经在上海帝国总领事批准。”<sup>[4]</sup>图书馆馆则、运营规程的制定改废必须预先通过外务大臣批准,图书馆出版物必须经外务大臣及上海日本总领事之审核,并随时向外务大臣及上海日本总领事汇报该馆的运营情况,尤其是图书馆的利用情况。因而上馆定期会对入馆者做详细调查,包括图书馆每月利用总数、每日平均数,阅览各类图书册数,利用者目的统计,利用者国籍别构成,利用者职业别构成,阅读者分布情况。日本政府欲通过此类调查,详细了解入馆者特别是中国读者人数、阅读目的、职业、阅读书籍种类乃至居住地分布情况。

以1940年上半年为例,图书阅读者中国8,839人、日本739人、其他国159人,杂志阅读者中国14,706人、日本3,018人、其他国98人,图书借出者中国201人、日本508人。读者职业:职业不明者达5,053人,商业者2,524人,公法务697人,学生156人……。阅读书籍种类:阅读杂志者最多,达5,951人;其次是小说,人数为1,904人;再次为文学,人数1,438人。借阅者总体分布状况:公共租界中央部,中国14,689人,日本2,773人;法国租界,中国3,535人,日本44人;公共租界北部,中国1,870人,日本904人;公共租界西部,中国1,911人,日本8人……。<sup>[5]</sup>对比借出者和馆内阅读者人数,中国读者绝大多数在馆内阅读,这应与战时上海之情势有关,部分普通市民出于安全考量,避入图书馆且可免费阅读书籍,是时抱此想法者不足为奇;然中国借出者竟不及日本半数,战时上海市民维持生计尚且困难,自是难以支付借出保证金。从职业看,职业不明者占绝大多数(大多应为青年学生,故未有确切职业记载),其次为商业人士,折射出上海商业大都市之实态。从读书种类看,杂志、小说和文学颇受欢迎,由此管窥出其时上海市民之阅读取向。从分布情况看,读者人数以公共租界中央部为最多,依

[1]按,1923年3月,日本第46届国会通过《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》,决定退还部分庚款,补助“帝国(日本)在中国实行的教育、学艺、卫生、救恤及其它文化助长等相关事业;帝国侨居中国的本邦人民的前述相同事业;帝国在中国进行的相关学术研究事业。”(参见《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關係條約抜粋及勅令並清国債金債券》,《東方文化事業部關係會計雜件 第一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050150626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。)

[2]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關係雜件 / 経費關係 第二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050160038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。

[3]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経費關係 自昭和十一年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關係雜件 / 経費關係 第一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050160036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。

[4]《命令书第七号 昭和十四年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關係雜件 第三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050160030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。

[5]《上海近代科学図書館關係雜件 / 経費關係 第二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B050160046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。

次向周边地区递减,显示出上馆的宣传网络,即以租界中部为核心,以周边区域为重点的辐射网,从而加大了对租界内外上海市民、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宣传和诱导。

上馆各项工作必须全面配合日本侵华国策。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日本所谓“对支文化事业”侵略本质日趋显现。相关例证俯拾即是,譬如外务省曾极力宣扬其文化政策,“旨在推进新东亚建设,实现东洋民族自觉和东洋道德复活的要求”。“圣战的精神在于实现包括全支那民众的东洋民族之道德复归,此亦为我对支文化工作之主要目标,日本负有教导者的任务,即引导东洋民族向新东亚建设进军。”<sup>[1]</sup>日本当局非常重视在上海的“文化事业”,认为在上海租界的文化工作比中国其他地区具有更重要的“使命”。鉴于上海受欧美思潮影响较大,加之租界内仍聚有大批反日进步人士,日本欲通过鼓吹“东洋民族觉醒”,排挤欧美国家在沪上势力,清洗租界内抗日力量,以实现日本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主宰地位。上馆由是成为日本实现此种“使命”的重要机构,日本当局明确要求上馆在公共租界内频繁举办展览会、街头文库、电影会、音乐会等活动,通过此种现实的、大众的日本文化介绍,彻底“矫正”上海民众以往的排日观,培养新型的亲日观。该馆也正是基于此种政治动机,进行文化侵略、渗透,全力配合日本当局侵华政策,馆长上崎直言不讳道,“本馆创设之目的在于,对支那介绍、传播日本文化;而时代要求则是日本人有关支那、满洲、蒙古实情的积极调查研究,实为当前紧急而又重要之课题”<sup>[2]</sup>。上海许多进步人士对该馆的文化侵略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和反击,如1941年上馆开设第二次夜间街头文库,其会场遍布各种写有“打倒日本走狗”、“打倒日本军阀”、“打倒汪派走狗”等字样的传单。之后该馆又计划在外滩公园举办公园文库,终因上海反日进步人士的坚决抵制而作罢。

#### 四、结 语

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绝不限于军事、政治侵略,文化侵略亦是重要一环。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,亦强化了对华文化侵略,日本外务省抛出所谓的“新规事业”,并在上海创办上馆,使其成为日本在上海的文化侵略据点。该馆成立初期,因其经营、管理不善,又逢松沪会战,加之上海民众的排日、反日情绪高涨,职是之故该馆发展迟缓,且一度闭馆。上馆复馆后进行诸多调适,例如注重选购图书、建立各种文库,发行图书目录和馆报,调整人事和管理,特别是楠田继替司书以后,组织该馆采取一系列具体行动,诸如开设夜间街头文库、举办各种展览会、推动馆际合作、开办日语学校、加强在华调查研究。客观而论,部分举措不啻为打破图书馆闭塞状态和陈旧运营模式之要径,有些方法至今仍为一些图书馆所借鉴,然该馆并非真心服务于上海民众,而是通过此类活动宣传日本文化、排挤西方势力、毒化上海民众思想,进而消泯其反日、排日意识,维系日本在上海的殖民统治。日本政府更是在经济上、管理上操纵上馆的运营,使其各项工作紧密配合其侵华政策,该馆最终嬗变成日本侵略、控制上海的重要机构。黄福庆一语中的,“这些文化社会事业,在日本军阀侵华的过程中,成为一种无形的武器,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,实为不可忽略的问题”<sup>[3]</sup>。日本对华善用两面开弓战略,一面为军事的,另一面为非军事的,二者契合点在于彻底征服中国。所幸的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败亡,上馆最终解散,所藏书籍最后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。

[责任编辑:肖 波]

[1]《近代日本文学展览会报告书 昭和十六年》,《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关系杂件 第三卷》,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: B05016003200,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。

[2]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:《支那·满洲·蒙古·序文》,藏书特種目錄第1輯,1939年3月。

[3]黄福庆:《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》自序,(台北)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。